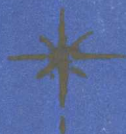


中共上海党史资料丛书

三十年代中国 社会性质论战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主编

知识出版社

中共上海党史资料丛书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周子东 杨雪芳 编著
季甄馥 齐卫平

知 识 出 版 社

上 海

中共上海党史资料丛书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周子东 杨雪芳 编著
季甄馥 齐卫平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古北路650号)

(沪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6,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 7-5015-5324-6/D·30

定价：1.10元

前 言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在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与此密切联系着的，又进行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稍后一点，还发生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围剿”和反“围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怎样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即中国的国情，是这些论战的中心题目，而这个题目，又是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依据或出发点。正因如此，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到托派分子，都不遗余力地要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企图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斗争制造各种理论根据；而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和阐述，同时对各种反动谬论作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一些学术界人士也卷入了这场论战，其中，也有的确实只是作为学术研究进行了探讨。尽管在当时，党中央领导犯了“左”倾错误，论战也不免受到“左”的影响，但是在斗争的实践中，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又或多或少地抵制了“左”的错误，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情况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反击和粉碎敌人从思想理论战线上发动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无疑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早在1937年，何干之同志编著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书，并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对当时论战的情况及其意义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和评价。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集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则在1935年就由新知书店出版了。近年来，高军同志又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重要资料作了选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关于论战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我们不打算再作很详细的介绍，而只是作了一些简要的叙述和说明。我们是把30年代的这场论战，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整个认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来加以考察，从而说明把近代中国社会明确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成为进步的思想理论界一致公认的一个确定的概念，这是当时这场论战所取得的最大成果。虽然，这样的观点在早先也有人多少提到过。我们现在把前前后后的一些历史情况，即有关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加以贯串起来，也许有助于人们弄清来龙去脉，从而更好地理解这场论战的作用和意义。

历史告诉我们，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即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不那么简单容易。而离开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也就谈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然也就谈不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正确的认识必须经过革命的实践，同时也要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认识中国的国情，是一个大课题，所以不能不经过相当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复杂的斗争。回顾这些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对我们今天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会有不少启示的。

自然，30年代的历史情况，是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围剿”与

反“围剿”的紧张、尖锐的生死搏斗的环境下，即便是思想理论斗争的战线上，也不能不带着浓重的火药味。所以有些问题的论述，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以至今天在学术界还有感到需要提出来重新讨论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古代中国社会史的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等）。由于我们所要阐明的中心，不在那些具体问题上，所以我们说的还是论战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对于那些具体问题，我们未作深入的专门研究，只好让有关的专门家去探讨了。作此附带声明，是为了免得干扰今天学术界的百家争鸣。

在研究这个课题中，我们访问了曾经参加当时论战的一些老同志，其中有吴亮平、李一氓、薛暮桥、许涤新、柯柏年、陈翰笙、冯和法等，他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和宝贵资料。他们在回忆当时情景时富有感情的谈话，更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场论战的重要性。在这本书中我们选择与刊载了几份谈话记录，供读者参阅。在本书的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冯契、吴泽、陈旭麓、曾乐山、姜义华、林茂生、刘炼、金立人等同志热情指正，在这里向他们诚挚地表示谢意。

本书由周子东、杨雪芳、季甄馥、齐卫平四人合作编写，最后由周子东统稿。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存在的问题恐怕还是不少的，如蒙批评指正，不胜感激之至。

编 者

1986年7月

目 录

一、最初的认识·····	1
二、论战的发端·····	10
三、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	24
1. “新思潮派”和“动力派”·····	24
2. 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27
(一)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27
(二)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30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	34
四、历史的追溯·····	46
1. 引起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46
2. 在历史问题中包含着现实的斗争·····	48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49
(二)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的问题·····	54
(三)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	57
五、在农村问题上的深入·····	66
1. 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66
2.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一个序幕·····	72
3. “中国农村派”与“中国经济派”·····	74
4. 争论的两个主要问题·····	78
(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问题·····	78
(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	83
六、论战的总结·····	99

1. 成绩和缺憾99
2. 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得到的认识 105
3.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总结 109
4. 还有再认识的问题 112

附录:

- 一、调查访问记录..... 116
 1. 吴亮平谈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116
 2. 薛暮桥回忆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有关情况 119
 3. 冯和法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一些情况 128
 4. 刘炼谈何干之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131
- 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大事记..... 135

一、最初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就是不断加深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各个方面的特点的认识。毛泽东指出，懂得“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①。我们经常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各个方面的特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制订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去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以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的大国，要认识其社会的性质和各方面的特点，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从认识的规律来说，就不能不经过相当艰苦和曲折的实践，不断地摸索与总结经验教训，才有可能逐步地得出比较正确和完整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们的利害关系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一样，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意见，乃至展开激烈的论争，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30年代主要发生在中国文化界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以及与这个问题紧密相联的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逻辑所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回顾30年代的这场大论战，就是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作为整个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来看待这次论战的意义和作用。

原来，自从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很多人都谈论起中国的“国情”问题。许多改革者，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以求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时候，也不能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努力使他们制订的各种救国方案能够适合中国的“国情”。康有为讲维新立宪，孙中山要革命共和，他们当时都需要尽力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最符合中国的“国情”，因而也是救国的“最佳方案”。应当承认，作为近代中国提倡改革的许多先驱者，他们对中国的問題具有比较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在当时发表的很多意气风发的论述之所以能够激动人心，号召群众，也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揭露出近代中国的时弊，或者说是对中国“国情”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虽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科学的思想武器，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把中国的国情真正搞清楚。至于那些顽固守旧的反动派，经常把“国情”两字挂在口头上，则是为了抵制和拒绝任何改革。例如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反动舆论的美国人古德诺之流，也以任何事情要考虑“本国之历史习惯与夫社会经济之情状”为词^②，大肆谈论起中国的“国情”来了。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外反动派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呢？究竟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呢？他们就只能胡言乱语或者简直就是不知所云了。其实，事情恰恰与那些反动的叫嚣完全相反，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也就是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才有可能科学地、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国情。这个正确的结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的“国情”——是一个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在现在说来确实已成为众所周知，或者说是已经被大家公认了的常识。但中国人民认识到这个道理，却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而最初指明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的，还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导师——列宁。

1912年7月，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他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状况等方面，说明了这个亚洲的“共和国”里，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还是严重存在着的封建制度的东西。

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有名的著作中，又把中国和当时的波斯与土耳其一起“列入半殖民地国家”，或者叫做“半独立国”。列宁认为这样的国家是一种“典型的‘中间’形式”，“过渡的国家”，因为帝国主义的争夺，使这些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

列宁当然只是从理论原则上指明了中国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他分别地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这两个方面来概括当时中国的国情，还没有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列宁不是、也不可能专门来详细地考察中国的社会及其性质问题。中国的事情，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具体地考察中国社会的性质，这个任务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应当承认的事实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最初也是认识不清的。大家知道，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当时提出的任务，是直接要求推翻资产阶级和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其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但这样把中国的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任务完全等同起来，

不能不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还缺乏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1922年初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才开始对中国社会性质有比较正确的认识。那次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③，要求“一切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要彻底明白民族革命与劳动运动间的相互关系”^④。大会对远东各国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所作的许多分析，大大地启发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有了一个新认识。他们回国以后，把大会的精神向中央作了传达。党中央经过仔细的研究，乃在1922年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在这个文件中，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当时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接着，中国共产党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进一步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指出当时“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⑤。大会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种(定)程度”，但“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助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⑥。这就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它所遇到的矛盾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彻底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些正确认识，在当时有些人看来，是一种“标新立异”，并立即招来了非议。如胡适对于

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这一论断，便说是“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在他看来，“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因为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现在无论是那一国——日本、美国或英国……，都不能不让中国人民来解决本国的政治问题，来建设本国的统一国家”。所以，他主张中国人根本“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①。至于中国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军阀割据是人们“强求统一”造成的“恶果”^②。胡适的这些论调，就是针锋相对的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所作的正确分析与论断。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识，的确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获得了一切爱国的革命志士的赞许或首肯。最明显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也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第一部分，分析“中国之现状”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而“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由此造成国内的状况，就是：“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流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③。这些描绘，都是真实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状况。

当然，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以后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有些

论述是有变动的。例如，他为了强调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深重，就认为“我们不能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应该要叫做次殖民地”^⑩，意思是比殖民地国家的地位更低。又如，孙中山说到封建主义的时候，他只是理解为中国古代封建诸侯那样的制度，所以他认为“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⑪。……由于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不同的世界观，所以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就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些基本点看来，如：中国是被帝国主义列强所压迫和奴役的国家；当时中国的军阀统治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依然实行专制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与军阀内乱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大体上是相符合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一致认为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叫国民革命，并结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随之而来的，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卷起了大革命的浪潮，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反映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革命要求的口号声与歌声，就迅速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

但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总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⑫。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也应当说是缺少专门的深刻的研究。且不说我们没有象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而写成的《资本论》那样的巨著，也没有列宁研究俄国社会而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样的著作，就连把列宁已经提出的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确认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件事,也还没有完成。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发出的文件,或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在党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的小册子来看,差不多都是根据列宁的指示,分别地阐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种种情况,来作为例证,而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构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完整统一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的社会性质。虽然,在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共旅俄支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有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地方^⑧,我们认为,从个别同志的个别报告中出现的東西,还不能代表全党的认识水平。而从当时全党的认识状况来说,还是应当承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完整统一的概念,尚没有完全确立。事情不难理解,一个科学的概念产生并为大家所接受,乃至成为公认的东西,必须要进行充分的理论上的论证,证明它是从客观实际事物中正确地概括与抽象出来的,有些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大家所信服的结论。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情况是: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诸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系与区别、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怎样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统一战线形式和党的策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怎样掌握革命的武装……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特点密切相关。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如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在某些问题上也都进行过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并且提出了不少正确的见解,因而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有某些深化了的地方,但是就多数同志来说,却在投身于大革命紧张的工作实践时,忽视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当时党内也较

多地强调要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甚至那时还出现过“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的现象^④。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还研究得很不够，以至没有在全党同志的思想中有一个完整的明确的概念，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思想认识上的缺陷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就会造成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付出惨痛的大量流血牺牲的代价。从革命发展规律和人的认识规律来说，这种事情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事实上，在一场大的革命运动来潮之际，也不大可能预先都准备好一套十分完备的认识和理论。正因如此，作为人民革命的逻辑发展过程来说，就不能不经历如毛泽东所说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曲折的道路。而这个曲折的过程，也正是与他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认识发展的过程相适应的。原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掀起了大革命浪潮，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打击，无数革命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惨遭杀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人们不能不回过头来，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重新进行思索与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什么？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策略、方法、道路……又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如此等等，都需要重新认识。在这些问题面前，各个阶级、各种政治派别，自然都要根据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判断，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意见和理论。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合乎逻辑地开展起来的。

注 释:

-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② 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近代稗海》第三辑。
- ③ 这个决议案是在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基础上,经过讨论,略加修改后通过的。
- ④ 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
- ⑤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
- ⑥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
- ⑦ 《国际的中国》,载《努力周报》第22期。
- ⑧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载《努力周报》第19期。
- ⑨、⑩、⑪ 《孙中山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版。
- ⑫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 ⑬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 ⑭ 刘少奇:《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